

人类学讲堂

TEACHING ANTHROPOLOGY

潘 蛟 主编

进展及方向

人类学：我们做什么

广东外来少数民族现状与服务管理模式

民族及治理

关于清代满藏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内地化与一体化：清代藩部的长期发展趋势研究

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天下与关系主义

文化、历史与表述

中国的民族大走廊——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特点

寻找香格里拉——东方主义与西藏问题

阿希克：最后的行吟者

羊场布依族盘歌与百越族群

幽冥世界——史前西域居民的精神生活

日本文化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北京市“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项目—重点学科人类学”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经费”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学科建设项目—北京市重点学科人类学”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人类学讲堂

(第三辑)

潘 蛟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谐哲源新说:函学纲要简编 / 俞明三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486—0344—3

I. ①和… II. ①俞…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8033 号

和谐哲源新说——函学纲要简编



作 者—— 俞明三

责任编辑—— 钱丽明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页 8

印 张—— 14.75

字 数—— 40 万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0344—3/B·19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书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北京市“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项目—重点学科人类学”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学术活动经费”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学科建设项目—北京市重点学科人类学”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人类学讲堂

(第三辑)

潘 蛟 主编

理部门倒也很给面子,一学期十多场讲演下来,这个报告厅至多也不过一二场没让我们预订去罢了。然而,即便如此,这个讲座仍有爆棚的时候,报告厅通道上的阶梯全被坐满,有的围坐到了讲台周围,有的甚至在厅尾和厅边缘一直站立着听。记得 James Scott 就曾遭遇过此况,以致他感叹从未料到自己也会像明星一样受到如此热捧。被民大师生对人类学知识热情所感动的中外学者,远不止 James Scott 一位,很多学者因此把民大的这个报告厅当做了人气最旺的人类学讲场,而这也正是我们的期望。

当然,讲座是否爆棚主要取决于讲演者人气的高低,但的确也有不少人类学讲演者是在民大确认了自己的人气竟是如此之高。这个讲座被安排在秋季学期的每个周五晚上的 7~10 点,其中两小时用于讲演,一个小时用于提问和讨论。与此讲座竞争听众的不仅有校内其他院系开设的讲座,而且还有文华楼斜对面广场上的周末露天舞会。但是,这个露天舞会并没有抢走多少听众,反倒是此讲座散场时涌出的人流让广场上的舞会显得有些寂寥。

民大学生喜欢这个讲座,他们常常相互打听周末谁会来讲演。以致有人戏称,“倘没有这个讲座,周末学生们都不知该干什么”。判定民大人为什么会对人类学有如此高的热情,这可能是一件容易惹麻烦的事情,但我还是想说,这可能是因为民大师生很关心人类学对于人类多样性所做的探讨,更喜欢这个学科因此生成的对待人类多样性的态度。

这个讲座的成功得益于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众多教员的积极参与。他们与学生一起在座听讲,创造出了一种难得的师生同堂受业、相互砥砺、切磋学问的感人氛围。教员们在场评议和提问有助于学生印证自己对于讲演的理解,也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和提问,活跃和深化了对于讲演的讨论和理解,而通过学生们的提问和讨论,讲演人和在场的教员对他们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这个集子中的文稿绝大多数是根据讲演录音整理而成,其中大多数文稿经过讲演人的审阅校订。少数文稿未经讲演人审阅,原因是他们太忙,没能按期交回审阅稿。但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我怕他们大改录音稿,添加了许多学生们在讲座中不曾听到的东西,以致讲座上的评议、提问和讨论互动失去了根据。因此,我没有坚持去催稿。此文集中的一些稿子,后来被讲演人经过加工完善后投放到了其他一些刊物和专著中去发表,这并不是我顾忌的,因为通过这个文集,我想反映的除了这些作者的起初成果和思想之外,还有这些作者当

时与民大师生的教学互动。为此,除了因没能收集到更为完整精细的加注讲稿而觉得有些遗憾之外,我也还心怀侥幸地以为,这些作者或许也还是喜欢以这种方式发表其讲稿的,因为这毕竟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他们当初的讲演,及其引来的评议、提问和讨论,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他们讲演时与听众发生互动的真实场景。

最后,我想说的是:谢谢我校民社院的各位领导!没有你们在资金和人事安排上的大力支持,这个讲座将难以为继。谢谢我校民社院研究生会的各位同学!没有你们提供的组织支持和讲演录音整理,办成这个讲座和编成这个文集将十分艰难。谢谢周末前来参加这个讲座的所有师生!没有你们在场,这个讲座将毫无意义!

潘 蛟

2012 年 5 月于北京

目 录

进展及方向

- 人类学:我们做什么 3
 主讲人:庄孔韶(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3
- 广东外来少数民族现状与服务管理模式 21
 主讲人:马建钊(广东省民族与宗教研究院院长 研究员) 21

民族及治理

- 关于清代满藏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45
 主讲人:陈庆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45
- 内地化与一体化:清代藩部的长期发展趋势研究 62
 主讲人:张永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62
- 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83
 主讲人:李世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83
- 天下与关系主义 97
 主讲人: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97

文化、历史与表述

中国的民族大走廊——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特点	113
主讲人:石硕(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	113
寻找香格里拉——东方主义与西藏问题	138
主讲人: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138
阿希克:最后的行吟者	169
主讲人:刘湘晨(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	169
羊场布依族盘歌与百越族群	180
主讲人:吴秋林(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	180
幽冥世界——史前西域居民的精神生活	200
主讲人:刘学堂(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0
日本文化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	211
主讲人:潘宏立(日本京都文教大学文化人类学系教授)	211



进展及方向

- ▶ 人类学：我们做什么
 - ▶ 生存性智慧
 - ▶ 广东外来少数民族现状与服务管理模式
- 

又有基因本质,基因又有原子链团本质,而原子链团又有原子本质,等等。终极本质是到“底”的本质,这个到“底”也是某一层次的“底”。也就是在某一层次上,研究所谓“是其所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也就是在某一层次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问。

数学有“基础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分类,鉴于当前哲学界哲学分类的混乱(见“还我哲界井然”一节),不妨对哲学也可如此区分。

哲学追究事物的终极本质,如果事物是以世界整体为对象的,则是基础哲学,如果事物是以具体领域、具体层次、具体行业、具体学科、具体形式甚至具体个人或物体或事情为对象的则是应用哲学。在学校教育中,研究哲学的学科叫哲学学科,以基础哲学为主的,则是基础哲学学科,以应用哲学为主的又可以以类属关系的层次,分别设为一级应用哲学的学科,如社会哲学、自然哲学、思维哲学等。二级应用哲学的学科,如社会哲学中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等。三级应用哲学的学科,如政治哲学中的思想哲学、教育哲学、心理哲学及与其他类属交叉的学科哲学,等等。

“函学”是以世界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因而函学是基础哲学,基础哲学一般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几个方面研究整体世界,函学的本体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或“实践本体论”,也不同于康德的“物自体本体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体论”,更不同于其他的什么“种子本体论”、“原子本体论”、“语言本体论”,而是分层次的“过程本体论”,对于世界整体的本体,则是在人类所及的层次上进行追求;函学的认识论也是分层次的,它包括“自我、本我、超我”、“境化、我化、异化”、“科识、俗识、哲识”“三三”认识论;函学的方法论则是“实证、信仰、思辨”、“形而上、形而下、形而中”、“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函变逻辑”的“三三”方法论。这在本书中都有叙述。

(二) 函学专心研究哲学的基本问题

1. “变与不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传统哲学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见



这是昨天在复旦大学交流的问题。现在各个学科都在互动,要从资源的竞争、交换的过程来讲互动。如果从人类学非理性的情感角度讲,这个互动的范围在电影人类学方面是要讨论非理性的层面的互动是什么样的状态,怎样能够比较好地进入镜头,使我们的镜头语言不和一般的纪录片的语言一样。虽然纪录片的理论和人类学的理论有叠压,但是看完纪录片后不一定能很清楚地识别人类学的理论在哪里体现,这需要作很多的讨论。

我们的老师们,例如林先生他们都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做这些的,他们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做研究。我曾和一位法国的影视人类学制作者珐琅交流,他是第 16 届世界人类学电影大会得奖作者,他的汉古文非常好。我们吸收了很多国外的理论,经过转换能不能产出自己的说法,很多大学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前些年跟他讨论,试图把明代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的一些文论思想提出来,他们是反对守旧和矫揉造作的,这实际上和我们在大学写论文、拍电影一样,反对守旧及矫揉造作。公安派的理论有性灵、真、趣三个要点,但如果外语不好,即使翻译出去,也不能把中国人的思想转换出去,所以我们要借助精通中国文化的人把这个转换出去。2010 年 4 月在洛杉矶有一个影视人类学中美对话,因为中国几千年人伦问题很突出,古代很多作者借助《论语》对人的关系有很多说明。很多描述是用比喻来说一个事,没有像现在的教科书那样给出一个清楚的定义,但是要读上二三十个关于人的比喻可能就理解了,却又说不出来。性灵像诗人写诗的灵感一样,包含着文化直觉的成分,我们要推敲如何去翻译。无论拍电影还是写论文,“真”不一定是真实,我们现在写文章有很多约束性,最后就表达不出真,公安派的“真”是要有童心一样的真,从心里透过胳膊进入笔端,他们推崇这样的真。珐琅说公安派的思想很绝妙,如果发自内心地真要是进入笔端就是写文章了,同时也可以进入镜头,他的思想对当代国际拍电影提出了尺度和标准。最有意思的是“趣”,外国人有他们的思路,说趣是“取走”的意思。谈到互动,例如到一个调查点调查或者拍电影,中间发生互动的最佳状态就像最好的爵士乐队,乐队的演奏者和乐器之间是完全投入的互动,若听众很熟悉音乐,跟听众也都是融为一体的,即都被取走了,这样的互动关系是最佳的状态。这也许比以往互动的说法和理论在层面上有一个提升。昨天和复旦大学的学者交流影视人类学,谈如何体验西洋的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论学家的理论,他们能否找到一个中国学者发展互动的新出发



这是昨天在复旦大学交流的问题。现在各个学科都在互动,要从资源的竞争、交换的过程来讲互动。如果从人类学非理性的情感角度讲,这个互动的范围在电影人类学方面是要讨论非理性的层面的互动是什么样的状态,怎样能够比较好地进入镜头,使我们的镜头语言不和一般的纪录片的语言一样。虽然纪录片的理论和人类学的理论有叠压,但是看完纪录片后不一定能很清楚地识别人类学的理论在哪里体现,这需要作很多的讨论。

我们的老师们,例如林先生他们都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做这些的,他们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做研究。我曾和一位法国的影视人类学制作者珐琅交流,他是第 16 届世界人类学电影大会得奖作者,他的汉古文非常好。我们吸收了很多国外的理论,经过转换能不能产出自己的说法,很多大学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前些年跟他讨论,试图把明代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的一些文论思想提出来,他们是反对守旧和矫揉造作的,这实际上和我们在大学写论文、拍电影一样,反对守旧及矫揉造作。公安派的理论有性灵、真、趣三个要点,但如果外语不好,即使翻译出去,也不能把中国人的思想转换出去,所以我们要借助精通中国文化的人把这个转换出去。2010 年 4 月在洛杉矶有一个影视人类学中美对话,因为中国几千年人伦问题很突出,古代很多作者借助《论语》对人的关系有很多说明。很多描述是用比喻来说一个事,没有像现在的教科书那样给出一个清楚的定义,但是要读上二三十个关于人的比喻可能就理解了,却又说不出来。性灵像诗人写诗的灵感一样,包含着文化直觉的成分,我们要推敲如何去翻译。无论拍电影还是写论文,“真”不一定是真实,我们现在写文章有很多约束性,最后就表达不出真,公安派的“真”是要有童心一样的真,从心里透过胳膊进入笔端,他们推崇这样的真。珐琅说公安派的思想很绝妙,如果发自内心地真要是进入笔端就是写文章了,同时也可以进入镜头,他的思想对当代国际拍电影提出了尺度和标准。最有意思的是“趣”,外国人有他们的思路,说趣是“取走”的意思。谈到互动,例如到一个调查点调查或者拍电影,中间发生互动的最佳状态就像最好的爵士乐队,乐队的演奏者和乐器之间是完全投入的互动,若听众很熟悉音乐,跟听众也都是融为一体的,即都被取走了,这样的互动关系是最佳的状态。这也许比以往互动的说法和理论在层面上有一个提升。昨天和复旦大学的学者交流影视人类学,谈如何体验西洋的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论学家的理论,他们能否找到一个中国学者发展互动的新出发

点,有点从古代文献中勾陈的意思。

最近十多年,因为中国发展非常快,社会文化变迁很剧烈,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卷入了应用性的项目中,很少有学生不跟做项目。学术的人类学和应用的人类学,我们不贬低任何一个,因为人类学在早期应用性就很强,应用性的人类学如果做得好也很好。反着说,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做应用的,它只是在恰当的时候能把人类学的某些理论方法进行转换。例如仪式的理论传播得很远,在答辩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在做仪式,但是关键在于仪式理论有没有提升,然而大多数都没有提升。我们做应用人类学的时候,要把教室里的理论方法转换得更好。我的人类学概论的教科书后面有七个电影,其中一个电影是长江中游的旅行记,这是20世纪90年代学完课程后,我们把年轻的老师和同学拉到长江三峡,我们遇到什么拍什么,是随意的,是流水账式的过程。选入教科书的意思是想看看研究生学完了理论方法后,是灵活掌握了还是死板掌握了。这就要到现场,在现场遇到什么事情是否能马上调动学过的理论方法和现场对接,如果能迅速对接,而且找到思想发展的基础,就说明该学生的学术悟性比较好。我们平时鼓励学生不要重复前人的东西,但要理解前人的东西,才能知道自己提升到哪里。下面就这个问题举例说明怎么转换。

教育人类学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反对重复,反对抄袭,反对没有新意,这就是转换的意思,英文就是“transfer”。就好像在大街上坐车,有很多车,有的人换得就很迟钝,有的人就能迅速换车。换车换得好的,在教育人类学上说就是转换得好,因为你不是抄袭别人,而是用学到的思想为没有遇到的场景找到连接的通道,这是研究生未来学习的最重要的观察点。那么多关于仪式的研究有新意的不多,就是转换的问题。有一年我到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是好多层的老图书馆,越是老的书越在楼上,我们去看马林诺夫斯基的书,现在借的书后面还有手工签字,谁借的都能知道。结果发现马林诺夫斯基的书仍然有无数人来借,但是同时代用他的思想做文章而没有新意的书却无人借。从图书馆这个场景看,很多人的著作不是没有劳动,就是没有找到新的通道,就等于那个时代马林诺夫斯基的陪衬,这对个人或许有益处,但在学术上没有创造性。

教育人类学就要有新意,有创造性。新意就是新质,就是有新的质地。林先生、费先生的书借的人很多,例如林先生的著作,是当年哈佛大学由功能主



义转移出来的平衡论的小型理论,书的前言是向他的老师及研究生同学致谢,当时他们都在一个班里讨论问题。他的老师讲平衡论,这个研究生班的学生都是跟着老师学平衡论。林先生在中国做调研,他的一个同学在爱尔兰做农业社会,还有一个同学在霍桑实验的工厂里做,把农业社会关于部落社会平衡论的研究成果转入工业社会的范围,成为工业人类学很有成就的人,他们都写过很多书。我找到他同班同学的书,我看到都是一个路子,全是和《金翼》的思想一样,都是用平衡论的思路做的。林先生是在福建做的,那两个同学中,一个在爱尔兰的乡村社会研究方面比较有名,还有一个进入工厂领域也做出了新的成就。虽然都是平衡论,但是用于不同的场景,因此每个同学都有创造性。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要鼓励同学把老师教的和自己的田野找一个学术创新的通道,平时练习可以模仿,但是最终的作品要找到创新点。

我刚才提到霍桑工厂的实验,这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学研究。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年我们做公共卫生研究,在做项目的时候就想怎样把学到的思想转换进去,我们就开始阅读组织人类学的著作,从早期到最近二三十年代的。人类学特别擅长非正规组织的研究,而工业社会、城市社会中偏正规组织,但并不是说社会学就擅长研究正规组织,人类学就擅长研究非正规组织。人类学对非正规组织很擅长,下面我举三个例子说明同一种思想的转换。

云南的呈贡每家都种鲜花,种得很好,并且都卖到国际市场上了。我们去看,白天的时候他们按照花的等级来准备,一定的时候就进行国际拍卖。在乡村会看到很多大棚,很多农民工(女工比较多)都来做这样的培植。有一个项目是做妇女的健康教育,包括防治艾滋病,这是一个企业的项目,所以就按照固定的正规组织的班组来做这个事情,所有班组的人都是按照各个院、系来做,宣讲健康教育和防治艾滋病。但是这样的内容不像老师讲一个普通的内容,讲的是和性直接相关的内容,最后的效果很不好。有人害羞就退场了,按照云南少数民族的习惯,没有人在大庭广众下说性的事情,总而言之健康教育的效果不好。人类学的工作就是进行评估,找到问题。人类学的博士论文要花很长时间,但是现代社会应用性的项目等不了那么长,于是就有了快速评估的办法,需要在短时间内经过调查找到问题,这和人类学的职业有了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们都是要一年才能调查完,那么就没有人用我们了,所以必须要在

很快的时间内完成。虽然我们不是在调查点做深入的调研,但是所学的理论方法能否在那个场景下很快发现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方面。研究生很快把班组的名单和报告拿回来,种花的女工都是周边三个县里招来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大姐大”,即从乡村进城的女工都是跟着她出来的,大姐大是有社会经验、有好的秉性、遇到事情能顶着的头儿。当时我们发现了三个大姐大,她们所带来的女工都平均分布在班组里,企业并没有考虑她们是哪儿的,分组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分的,所以三个乡村来的女工都混在一起,她们的健康教育也是在这个范围里做的。这些女工说,即使钱比别人给的少,她们也会跟着大姐大,因为如果遇到事情,大姐大会提供帮助。我们就把三个大姐大的群体从正规的名单里划分出来,之后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把健康教育很多隐私的东西培训给大姐大,之后她很快就会把健康教育落实得很好。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刚才也说了从霍桑工厂的实验就开始注意到组织的功能性了,到后来的工厂研究也要研究工厂内部人的情感、人与人的关系、工厂里面的人和外面的联系。所以我们在云南做种花女的健康教育研究,就是用组织人类学的办法,在正规组织里“拉”出非正规组织,三个大姐大群体就是三个非正规组织的线索,识别出这个就能做好健康教育。意思就是说人类学能用自己的理论方法快速找到改善健康教育的方法,人类学对公共健康教育也有贡献。

第二个例子完全不同。国务院扶贫办和开发银行曾经找我做一个评估,四川的地震到今天已经很长时间了,灾后重建的报告共有 40 份,让我来评估。这 40 份灾后重建的报告有农业经济学家做的,也有社会学家的、人类学家的、建筑学家的,还有政府的,都是围绕灾后重建如何让灾民生活得更好来做的。评估首先要阅读,这次地震光什邡这个地方就有 130 个 NGO 组织加入救援,这些救援队实施完救援后都会走,现在只有三个 NGO 还在坚持着。这三个就是很特别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有献身精神的外来人员做心理辅导。研究报告大体上是平面式评估,即灾后重建的各个项目都去调查,找出哪些机构做得好,之后表扬好人好事。政府是以表扬好人好事的办法总结灾害和灾后重建的。人类学关注政府组织,但是我们擅长观察非正规组织,或者说民间组织。

我们阅读了前些年墨西哥大地震后人类学家的作品,里面有一个理论很好,叫培植反应单位。我们把这个理论发展了一些,意思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在地震过后,什么样的组织能迅速重整旗鼓进行救助,这



样的组织在未来就要给予特别的扶植和培育,这就是人类学关于灾害的理论。如果我们只做平面评估的话,就只是点状地表扬好人好事,既不能做学术的梳理,也不能给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好的评估思想。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开始扩展研究。我自己阅读的是《中国赈灾史》,人类学的研究是当下,如果研究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调研点,就要考虑过去,灾害在历史上发生过。我们根据中国赈灾的情况找到两个重要的线索,震中是大家都愿意去、也必须去的地方,实际上山边有些交通不便的地方去的人很少,只有个体、医生、协会,因为“好的地方”轮不到他们,但是他们也要治病赚钱,因此没人去的地方都有自己的点,虽然设备不好,但是也能解决一些问题,政府的报告也只是表扬他们做得不错。我们看《中国赈灾史》里讲的关于非正规组织的贡献,找到两个线索,一个是行会,这不是指 1956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工商联,是指历史上就有的自主的组织,虽然唐宋以后名称不一样,但大体上都是这样的意思,他们都做了很多贡献,他们掌握着某一种物品的物流。在这次地震生命救援之后就是吃饭问题,这次做得好的就是个体、医生、协会、蔬菜、建材的行会。这些行会在地震过后,利用自己的物流渠道,迅速把他们弄来的物资调到震中,这和历史上赈灾的行会的作用很吻合。如果不这样,就看不到灾后哪些行会能重整旗鼓,迅速参与救援,我们挑出了七八种在赈灾中起了作用的行会。另一个是做了好人好事但被表扬的机会很少的寺庙组织。历史上寺庙组织对赈灾的贡献也很大,我亲自拜访了罗汉住持,住持说有 107 个孕妇临产时,把产床都弄到空地上。这 107 个产妇都是在寺庙的公共空间生产的,他等了一天半才等到第 108 个。除此之外,寺庙比较坚固,又有大的空场,发生灾害的时候是很好的避难场所。当时两个野战队的给养也是寺庙供应的。调查发现,中国很多地方的寺庙组织,寺庙和信众之间是由居士联系的,居士就是民间的佛教积极分子。有一个比喻说,是寺庙和信众通过居士的组织,就像叶脉一样,居士直接联系寺庙,同时又和广大乡村形成农民信众的网络,无数这样的网络就把民间的物资通过居士运到寺庙进行救灾。历史上也有清楚的记载。

人类学家报告的优点是注意到羌族在平面建筑空间体现他们信仰的问题,因此在建立赈灾博物馆时要把羌族的情况和贡献显示出来,(在这个方面)人类学家做了贡献。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历史的向度去思考问题,就能利用组织人类学对非正规组织擅长的优点。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什么样的组织

起作用,转过来看当下这样的行会是不是在起作用,结果发现今天和历史是有关联的,评估报告给国务院和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中国的特点,我们的行会、寺庙组织很发达,在赈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应该给个体、医生协会提供好的医疗设备,平时也要给予行会和寺庙组织关注,国际救援协会反而很快就走了。重要的是自救,自救就要找自己本土的组织。

刚才的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呈贡的种花女,第二个是赈灾中中国地方的民间组织如何起作用,都是组织人类学关注的非正规组织的问题,是两个场景,一个原理,如果以后出现第三个不同的场景,原理应该也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人类学的理论原理就像海军基地,如果我们掌握得好,出现什么场景都能应付,希望在座的同学以后有更多的创新作品。

评议与讨论

杨圣敏:庄老师刚才围绕人类学是什么、怎样做人类学研究进行了非常精彩的介绍,人类学分为两种偏向,一部分偏向理论研究,这是我们旧的传统,人类学传到中国 100 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前,我们的前辈主要做汉人社区的研究,重点是想说明一些理论。学院派的偏向不是空洞做理论,也做实地调查,但是这种实地调查跟后来应用研究的调查不一样的是,偏重理论的人在调查时脑子里也是有问题的,他们的问题是很多的理论是人类学宏观、中观、微观的理论。庄老师刚才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看到一些现象,脑子中马上就有理论出来了,婚姻家庭的、社会分层的理论就能解释问题,通过调查写出作品,把理论阐述清楚,这是一种研究。1949 年以后,也是由于环境的原因,人类学、民族学偏重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那时就比较偏重应用。一开始的研究也是在我们这儿,因为那时其他高校的人类学、社会学都被撤销了,应用研究也是林耀华先生、费孝通先生、潘光旦先生进行的。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法程序是一样的,但是其问题主要是想解决现实的问题,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最后也会归纳出理论,或是证明某些理论。所以,不管是做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目的都是一样的,一是发展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二是让人类学对社会有用,庄老师讲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关系,切入很多理论问题,这些前沿思想的交锋对我自己也很有启发。

庄老师和我师兄弟,都是林耀华先生的学生,我自己和庄老师研究的偏向不一样,庄老师做汉人社会的研究。林耀华先生的成名作《金翼》讲福建的